

《專題》「東亞區域安全與民主化政治發展」

東亞區域主義與區域安全： 進程、困難與前景

潘忠岐^{*}

摘要

冷戰後區域主義的興起使區域安全的構建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與歐洲相比，東亞在區域安全合作方面進展比較緩慢，尚沒能構建有效的多邊安全機制。與歐洲區域化從中心到邊緣的演進邏輯不同，東亞區域化的進程主要是從邊緣到中心。在東亞，作為外部挑戰的美國干涉和作為內部挑戰的中日對抗不僅幾乎同時存在，而且還陷入了某種惡性的螺旋怪圈，因此，歐洲區域主義的經驗難以直接適用於東亞。但在必須有效解決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區域安全建設方面，歐洲的基本經驗無疑又是適用於東亞的。目前，東亞只能致力於發展有限的區域主義，建構有限的區域安全結構，實現一種不完全的安全共同體。

關鍵詞：東亞、區域主義、區域化、區域安全、歐洲

收件 2005 年 12 月；修正 2006 年 4 月；接受 2006 年 6 月。

^{*}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E-mail: zqpan@fudan.edu.cn。

區域主義的強勁發展成爲冷戰結束以來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現象。通過發展區域主義構建區域安全體系和安全秩序則成爲維護國家安全，並進而促進世界安全的一個重要維度。在一定意義上，歐洲、北美和東亞是當代區域主義發展的三個典範。雖然從安全合作的角度來看，東亞區域主義發展遠遠滯後於歐洲，但即使從歐洲的視角進行審視，東亞的安全合作還是取得了明顯的進展和成就。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之所以滯後，主要在於，與歐洲相比，東亞安全合作不僅面臨著與歐洲相似的問題和困難，而且歐洲發展區域主義所特有的條件和動力，東亞沒有。這爲歐洲經驗是否適用於東亞打上了一個問號，也使東亞安全合作能否像歐洲那樣朝安全共同體方向邁進成爲疑問。但是，在必須有效解決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才能順利推進區域安全建設方面，歐洲區域主義的基本經驗無疑又是適用於東亞的。本文將通過考察區域主義的興起和區域安全的構建，以歐盟爲基本尺規審視東亞安全合作的進展情況，分析東亞區域安全建設的主要困難，探討歐洲經驗的適用與不適用，並以此展望東亞區域安全的未來。

壹、區域主義的興起與全球安全體系中區域安全的構建

一、區域主義的興起及其安全指向

區域主義並不是新事物，Edward Mansfield 和 Helen Milner 從區域主義與世界經濟自由化的關係出發，認爲區域主義已經出現了四次浪潮：19 世紀下半葉、兩戰間期、二戰以後和冷戰以後。¹ 他們把當代的區域主義稱作「區域主義的新浪潮」，也有人稱之爲「新區域主義」。²

區域主義在冷戰結束以後重新興起自然與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息息相關，但也與冷戰後國際政治的變化密切相聯。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政治中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人們開始越來越不再以地緣政治的術語而代之以地緣經濟的術語看待世界政治，強調意識形態鬥爭的高政治正逐漸被強調經濟貿易和投資的低政治所中和。與之相伴的是，國家安全關注的主要層次開始由國家治理（governance）轉向區

¹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pp. 589-627.

²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域治理和全球治理。

在此期間，區域主義組織在歐洲、北美和東亞獲得了迅速發展。在歐洲，1992年歐洲經濟共同體進一步整合為歐盟（EU），2002年歐盟開始啓用共同貨幣歐元，2004年歐盟接受先前的共產主義宿敵將成員擴大為25個。在北美，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於1994年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在東亞，東南亞國協（ASEAN）分別於1995年、1997年、1999年將傳統的共產主義宿敵越南、寮國和緬甸、柬埔寨吸收為正式成員。東協還向東北亞擴展，於1994年邀請中國、日本和韓國加入其安全組織東協區域論壇（ARF），於1997年成立由東協各國和中國、日、韓組成的「東協+3」機制。冷戰期間因超級大國霸權干涉而舉步維艱的區域計畫在非洲、中東等其他區域也獲得了發展。³

儘管2001年「9·11」事件後世界各國重新聚焦國家安全，但是區域化進程並未因此受阻，而是繼續闊步發展。對國家安全的先天之憂並未成為區域主義發展的障礙。相反，很多國家越來越把發展區域主義看作解決國家安全憂慮的重要管道。區域主義發展並不僅僅事關區域內的經濟合作，經濟一體化進程擺脫不了國家安全的糾纏，安全合作一向是發展區域主義的題中應有之意。歐盟的一體化進程最早始於歐洲煤鋼共同體，它從來就不是以單純的貿易甚至經濟因素為唯一目標，而是從一開始就帶有明確的政治和安全意圖，畢竟，煤和鋼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是直接事關國家戰爭能力的。東協成立的初衷也主要是在安全和政治領域促進區域合作，經濟領域的合作直到冷戰結束之後才真正逐步發展起來。經濟與政治、安全是不可分割的，通過發展經濟合作促進政治和安全合作是區域主義的主要邏輯。對這一邏輯的闡釋是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貢獻，而將經濟與政治、安全截然分割開來則是其被詬病的原因。⁴

二、區域主義的動力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區域化和全球化是由相同的進程推動的。⁵ 儘管對於區域化究竟是全球化的「絆腳石」還是「墊腳石」，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但是兩者

³ Raimo Vayrynen,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March 2003), pp. 25-51.

⁴ 潘忠岐，〈新功能主義擴溢理論及其批判〉，《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期5，頁8-13。

⁵ Richard Florida, "Toward the Learning Region," *Futures*, Vol. 27, No. 5 (June 1995), pp. 527-536.

共生共榮卻是不爭的事實。區域化和全球化就像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區域化對全球化既有削弱的一面，也有加強的一面。但不論削弱還是加強，其目的都是為了增進區域的自主性和相對於其他區域的競爭力。國家經濟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命運越來越與區域經濟不可分割。借助區域化提升本國經濟實力越來越成爲國家決策的理性選擇。正因爲如此，國家對區域化的參與，就像對全球化的參與一樣，正在不斷由被動轉向主動、由自發轉向自覺。Paul Bowles 曾經指出，「到 1991 年，構建區域貿易陣營的目的已經不再是以此使之更獨立於全球經濟，而是被看作確保繼續參與全球經濟的舉措。發展中國家的擔憂已經不再是對全球經濟的依賴，而是被全球經濟拒之門外。」⁶ 不僅如此，區域主義還「被看作國家走向國際化過程的一種工具，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政治實踐爲適應全球經濟的迫切需要而做出調整，國家合法性的主要來源變成了外部行爲體和外部機構。」⁷

從政治和安全的角度來看，區域主義發展的邏輯與此別無二致。國家的安全考慮究竟是區域主義發展的動力還是阻力，主要取決於國家對安全目標的界定和安全威協的判斷。如果國家把安全看作零和的、自助的，把威協看作特有的、國家性的，那麼國家在選擇安全戰略和安全手段時就會回避和排拒區域主義的解決方案。相反，如果國家把安全看作相互的、他助的，把威協看作共有的、非國家性的，那麼國家在選擇安全戰略和安全手段時就會接受和追求區域主義的解決方案。冷戰結束以後，特別是「9·11」事件發生以來，非國家行爲體的地位和作用不斷上昇，非傳統安全威協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國家安全觀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家在關注主權和領土的同時，開始更多地關注人權、公正、進步等公共價值觀；國家在強調軍事安全的同時，也開始強調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國家在擔憂傳統的國家性軍事威協的同時，也開始擔憂諸如傳染病、環境污染、跨國犯罪、恐怖主義、武器擴散等非國家性的非傳統威協。⁸ 國家安全在新時期面臨的威協不僅具有明顯的非國家性，而且往往是國家間共有的，是跨國性的，因此，國家在追求安全的過程中，單槍匹馬、自食其力往往力

⁶ Paul Bowles,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2 (Summer 1997), pp. 219-233.

⁷ Benedicte Bull, "'New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me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October 1999), pp. 957-970.

⁸ 潘忠岐，《世界秩序：結構、機制與模式》，上海，上海人民，2004，章五，頁 358-362。

不從心、事倍功半，國家間安全關係不僅日益成爲互助的，而且成爲互賴的。國家安全觀的這種轉變爲區域主義的發展，尤其是區域內的安全合作，注入了活力，甚至在「9·11」事件後國家安全重新成爲各國先天之憂時，區域主義的發展勢頭也沒有改變。

國家安全觀的轉變使區域內的大國和小國共同認識到，國家安全、國家實力和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都越來越與整個區域密不可分。借助區域化提升本國的實力、地位和 safety 越來越成爲國家決策的理性選擇。就大國而言，儘管區域內部的相互依賴使大國的自主性受到侵蝕，但另一方面，大國爲了維持在整個國際體系中的大國地位又需要依賴整個區域的力量。通過支援區域主義和區域化，區域大國可以增加它們在國際體系中的杠杆，並使整個區域成爲自我的某種放大，因此區域主義又可以成爲區域大國在全球安全體系中發展與其他區域大國關係的重要手段，歐盟進程中的法國和德國就是明顯的例子。就小國而言，多邊主義的區域化更是利大於弊。區域性的中小國把區域共同體看作實現自身安全和主權最大化的仲介，不管它們爲共同體讓渡了什麼，都會通過區域層次上安全和主權的重構而得到加倍的補償。而且，區域主義能夠創造一個和平穩定的環境，以利小國安全地進行經濟建設與國家發展。這就是爲什麼在東亞，多邊主義區域化的發展主要是由東協的中小國家宣導和推動的。⁹ 它們發展多邊主義和區域主義的目的之一恰恰是爲了應對在霸權干涉方面的脆弱性。通過 1994 年的東協區域論壇和 1997 年的「東協+3」機制，東亞的區域化不斷由中小國家管理脆弱性的機制向整合區域大國的安全體系轉變。因此，從政治和安全的角度看，國家對區域化的參與，也在不斷由被動轉向主動、由自發轉向自覺。

三、區域安全的構建與全球治理

區域主義興起的後果之一就是區域安全的構建。如果把世界安全分爲國家、區域和全球三個層次的話，那麼不僅國家安全越來越依賴于區域安全，而且全球安全也越來越依賴于區域安全，區域安全的構建成爲全球安全體系的核心。區域安全離不開全球穩定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樣毋庸置疑的是沒有區域穩定的全球安全也難以立足。重要的「全球性問題」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它已經說明瞭

⁹ Kishore Mahbubani, "The Pacific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5), pp. 100-110.

全球機構和機制在合力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的失能。任何全球治理的宏大計畫都面臨著深刻的結構不對稱問題，也面臨著區域行爲體在應對危險及其根源方面利益的不對稱問題。相對於全球安全而言，區域安全更容易構建。地理上的臨近使區域行爲體在處理相互關係過程中，經常面臨類似的問題、具有互動的文化、熟悉的傳統、相容的規則和共同的經驗。長期存在的鄰裏關係常常產生正式的、非正式的、超越邊界的治理策略，它們導致了相互依賴的產生和共同利益的形成。區域安全合作比全球安全合作需要考慮的問題更少，互動的障礙也更容易克服。相對於國家安全而言，區域安全更有利於促進全球安全的實現。區域化的發展可以爲解決全球性問題、採取全球性行動集結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力量。區域安全還具有明顯的擴散效應，它不僅提供全球安全所必需的區域穩定，而且會把區域穩定投射到區域以外。歐盟在這兩方面都提供了有力例證，它不僅爲歐洲帶來了真正的和平秩序，而且爲其他區域提供了可以效仿的建立區域安全機制的模式。

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來看，當代區域主義是國際體系多層次重構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關鍵的一部分。權力在區域層次的重構與權力在國家和全球層次的變革是不可分割的。區域可以被看作國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間的仲介層次¹⁰——Helen Wallace 稱之爲「全球化的過濾器。」¹¹ 國家組成區域共同體的結果是，用區域主義邏輯取代無政府邏輯，爲區域提供安全和秩序，並進而爲全球安全體系和全球秩序的構建準備條件。Charles Kupchan 就認爲，區域主義在北美、歐洲和東亞的發展將爲全球安全體系帶來良性、穩定的多極秩序。在他看來，北美、歐洲和東亞正在區域層次上成爲「良性單極」（benign unipolarity）。區域主義發展使大國「多元核心」（pluralistic core）同廣大「周邊國家」（periphery）建立了一種區域秩序。這個秩序是等級制的，大國具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但大國的影響力是良性的，大國實行自我克制並遵守共同的規範。這些區域秩序一同構成全球的多極秩序。經區域主義構建起來的區域安全將爲全球安全帶來「穩定的」和「非競爭性的」「多極結構」。¹² 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實現全球安全和全球治

¹⁰ Peter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1, No. 2 (June 1996), pp. 123–159; Robert Lawrence,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1996).

¹¹ Helen Wallace, "Europea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Complementary or Contradictory Trend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49.

¹²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理與其說是一項全球性任務，不如說是一項區域間安排，區域安全的構建對於全球安全體系和全球治理來說將越來越至關重要。¹³

貳、東亞區域安全的進程及其邏輯

一、區域背景

區域主義發展在全球議事日程中優先次序的提升並不意味著區域安全的構建進入了快速通道。構建一個區域安全合作的框架，使之可以真正稱得上是一個「區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在東亞，這個區域內的國家發展水準極其不一致，國內經濟和政治結構、宗教和信仰體系各不相同。這個區域遭受過由其成員之一發動的極其殘酷的軍事侵略，對戰爭的記憶在很多人的頭腦中仍然烙印深刻，這些人最關心的就是如何阻止區域霸權的再度出現。這個區域主要國家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政治對抗，它們共處於一種不安的和平之中，彼此發生衝突的危險遠沒有消除。這個區域很大程度上還依賴外部勢力即美國的存在來維持安全，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這個相同的外部勢力來維持經濟增長。這個區域廣大人民之間還幾乎沒有屬於自己的集體政治認同（identification）。

這種情形既適用於今天的東亞，也適用於二戰結束時的歐洲。在歐洲，類似的挑戰並沒能阻止區域主義的發展和區域安全的構建，歐洲的區域化至今仍在發展和壯大過程之中。與此相似，類似的挑戰也沒能阻止區域主義在東亞的發展，東亞的區域化也在深化之中，只是在進程上相對滯後於歐洲。背景的相似和出發點的接近一致，使歐洲成為審視東亞安全合作進程的重要參照。

二、東亞的區域化進程和安全合作機制

與歐盟相似，東協是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重要載體。儘管歐盟和東協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區域安全機構，但它們都明確包含區域安全合作的價值指向。1967年成立之初，東協的宗旨之一就是遵循正義、國家關係準則和《聯合國憲章》，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Fall 1998), pp. 40-79.

¹³ 參見，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促進本區域的和平與穩定。由於東協是在冷戰期間特殊的地緣戰略環境中創建起來的，因此冷戰的結束和地緣戰略環境向地緣經濟環境的轉變使東協存在的原初理由無以為繼。於是，通過同亞太國家，特別是中國、日本和韓國開展經濟合作，通過將前敵融入聯盟，東協又獲得了新的存在的理由，即經濟整合和區域發展。而且，通過 1994 年成立東協區域論壇等舉措，東協還在區域安全構建方面重新進行了定位，因此在區域安全合作上也獲得了新的存在的理由。同歐盟一樣，東協也通過擴盟實現發展，並都在擴盟過程中將前共產主義宿敵納入共同體。1995 年，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之後被邀請參加東協，寮國和緬甸於 1997 年加入，柬埔寨 1999 年加入。但與歐盟設立嚴格的入盟標準不同，東協更為開放和包容，它不要求入盟國改變自己的國內治理結構。東協的規範之一就是不干涉國內政治。也正因為如此，東協的權力結構是鬆散的，權威是有限的，它是一個非集權性的政府間和非政府間機構的聯合體，不像歐盟那樣擁有強有力的理事會、委員會和龐大的官僚機構。

而這種權力結構的不同不僅使東協在 1997 年的金融危機中沒能以任何有意義的方式採取行動¹⁴，而且使東協在區域安全機制建設方面幾乎沒法與歐盟相提並論。自 1994 年東協倡議並組織第一屆東協區域論壇開始，東亞國家區域安全合作的框架主要是在泛區域、跨區域和次區域等層面進行構建的。

(一) 在泛區域層面上，現有的安全機制主要有：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 (CSCAP)、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 (亞信會議) (CICA)、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東北亞合作對話會 (NEACD)、香格里拉對話 (Shangri-La Dialogue)、「六方會談」 (Six-Party Talks) 等。其中，東協區域論壇是東亞目前最重要的常設區域安全機制，它在參加成員和討論議題方面都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原本是經濟合作機制，自 2001 年「9·11」事件後反恐等安全議題被納入議程以來，該機構開始逐漸具有了多邊安全合作的職能，並因而也成為區域安全合作的一個框架。另外，東亞還發展了以問題為核心的區域安全機制，如圍繞北韓核問題展開的「六方會談」。僅從

¹⁴ 這對於東協來說是一種失敗，它暴露了東協在機構和政治方面的缺陷。參見，Douglas Webber,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September 2001), pp. 339-372.

參加的成員情況就可以看出，幾乎所有這些機制都涵蓋東亞、亞洲、太平洋、甚至亞太區域以外的國家，因此儘管都以東亞安全為議題，但它們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東亞的區域組織，而是某種泛區域安全機制。

(二) 在跨區域層面上，現有的安全機制主要有亞歐高峰會議（ASEM）、上海合作組織（SCO）等。前者主要謀求亞洲國家與歐盟開展政治對話、經濟合作、學術、文化、人際交流與合作。其中政治對話包括安全議題在內。後者主要從安全領域起步，初衷是解決邊界問題，後來擴大為安全合作組織，並將合作延伸到經濟領域。跟泛區域機制相似，跨區域機制也不以在東亞建構區域安全為首要目標。

(三) 在次區域層面上，除東協本身以外，中日韓首腦會議（China-Japan-ROK Summit）也為區域多邊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機制。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10月中日韓首腦會議正式發表了「推進三方合作聯合宣言」。這是由三國領導人發表的第一份三邊合作檔。

在東亞，真正具有區域意義的安全合作機制大概只有東協、「東協+1」和「東協+3」、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等。「東協+1」和「東協+3」，即「10+」機制，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東協同東北亞三國為加強經濟合作和危機管理而被迫設立的。這場危機深刻揭示了東亞區域內在經濟和社會安全方面越來越增加的相互依賴以及現存治理結構的脆弱。於是，「10+1」和「10+3」得以成立並很快發展成為區域對話和協商的論壇。儘管「10+」機制最初關注的主要是經濟合作問題，但是，參加者後來逐漸為其賦予了促進安全合作的新職能。¹⁵「10+」機制在反擊恐怖主義、解決非傳統威脅、敦促北韓放棄核計畫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很多重要安全合作成果都是在「10+」機制上達成的。目前，「10+」機制，尤其是其中的「10+3」已經成為東亞區域最重要的多邊經濟和安全合作機制。¹⁶此外，2005年開始的東亞峰會有望發展成為

¹⁵ 有關「10+3」機制的發展，參見，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May/June 2002), pp. 440-455; Douglas Webber,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 + 3,"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June 2003), pp. 251-277.

¹⁶ Markus Hund, "ASEAN Plus Three: 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3), pp. 383-418.

促進東亞合作與安全的新機制。若此，東亞峰會作為對東協相關機制的補充，可以在不否定東亞現有區域化進程邏輯的同時，調動區域大國的積極性。

三、東亞區域安全合作的不足及其根源

很多學者對歐亞區域主義的不同作過全方位的比較。¹⁷ 僅從區域安全構建的角度而言，歐亞兩個區域的不同就是顯而易見的。表面上看，涉及東亞區域安全的機構、組織和機制可謂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但實際上，真正能夠管理和支撐東亞安全合作的卻寥若晨星、鳳毛麟角。在歐洲，北約（NATO）、歐盟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CFSP）、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是構成歐洲安全合作框架的三根支柱。但在東亞，不僅沒有一個統帥性、全局性的區域安全合作框架，甚至沒有一根像樣的支柱。東亞很多泛區域、跨區域和次區域安全合作機制不是因為「太大」就是因為「太小」而無法擔當維持區域安全合作的重任。比較而言，以東協為基礎組建的區域安全機制，即東協區域論壇和「10+3」，無疑是目前東亞在區域安全機制建設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然而，這些機制還不能有效地保障區域安全。¹⁸ 不僅過於鬆散的東協區域論壇，即使最直接相關的「10+3」機制也構不成東亞區域安全的支柱。「10+3」充其量也只是三個「10+1」，而不是「13」。「10+3」中的「3」構不成一個整體，「10+3」就更沒有整體性可言。儘管相對於經濟成就而言，歐盟在安全合作方面的表現差強人意地不成比例，以至於常被人戲稱為「經濟巨人、政治矮子」，但是，歐盟是在手腳被嚴重束縛的情況下推進區域安全構建的。例如，美國對歐盟的「歐洲安全和防禦政策」明確提出必需滿足「三 D」條件，即：不削弱（diminish）北約作用、不複製（duplicate）北約能力、不歧視（discriminate）美國地位。¹⁹ 可以想見，在「三 D」前提下，歐盟還有多少創造的空間。然而，即便如此，歐盟在區域安全合作方面的進展也已讓東協望塵莫及。

¹⁷ 參見，Richard Higgot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urope and Asia Compared," in William Coleman and Geoffrey Underhill, eds.,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42-67; Peter Katzenstei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1.

¹⁸ 閻學通，〈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東亞季刊》，1999，春季卷（卷30，期2），頁97-110。

¹⁹ Chris Layne, "US Hegemony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NATO," in Ted Galen Carpenter, ed., *NATO Enters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2001), p. 78.

在區域安全構建方面，東協之所以與歐盟不可同日而語，除了權力結構方面的原因以外，還與東亞區域主義獨特的發展進程和演進邏輯有關。大國，特別是法德軸心，是歐洲區域主義發展的發動機，不僅走向歐盟的進程主要是由它們推動的，而且歐洲區域安全框架的建構也與它們的宣導密不可分。而在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主要是由中小國家推動的，東南亞各國無疑是東協發展的主力軍，東亞迄今最重要的區域安全機制也主要是由它們發起的。例如，東協區域論壇、「10+3」、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亞歐會議等都是在東亞中小國家的倡議下發展起來的²⁰，中國和日本甚至在 2003 年先後正式加入了東協 1976 年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這與歐洲區域主義的很多倡議來自大國明顯不同。

如果說歐洲區域化的演進邏輯是從中心到邊緣，那麼東亞區域化的演進邏輯就是從邊緣到中心。²¹ 歐盟和東協的擴大很好地說明瞭這兩種發展邏輯的不同。歐盟的擴大是由中心大國向周邊中小國家延伸，而東協的擴大則是由周邊中小國家向中心大國延伸。儘管歐盟擴大因設立苛刻的前提條件而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特徵，東協擴大因不要求改變國內治理結構而表現出開放性和包容性特點，但與歐盟已經包括幾乎所有區域大國不同，東協並沒有吸收這個區域的關鍵大國——中國、日本和韓國入盟，甚至沒有這樣的計畫。這不能說不是東亞區域化發展的悖論。作為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主要載體，東協一方面希望通過組建東協區域論壇和「10+3」以防止被中國和日本邊緣化，同時也不被歐盟和美國邊緣化²²，但另一方面，東協又對日本的過去（軍國主義）和中國的未來（可能的霸權主義）感到擔心²³，出於維持自身相對權力的需要，東協不得不致力於限制區域主義在東亞的發展，以至於像中國、日本和韓國這樣的東亞大國反被邊緣化了，它們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可憐地以附加的東協區域論壇（1994 年）和「東協+3」（1997 年）形式參與了東亞區域的經濟合作和安全建設。

此外，東亞與歐洲在區域安全構建方面還有一點不同，體現在區域認同上。

²⁰ Kishore Mahbubani, "The Pacific Way;"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²¹ 這裏的中心和邊緣主要是依國家實力的大小來界定的。

²² Kishore Mahbubani, "The Pacific Way;"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²³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安全意義上的區域與寬泛界定的經濟意義上的區域存在很大差別。區域安全的構建需要區域認同的塑造與培育。具有共同的安全威脅、對某種主導性價值觀和規範的認同或排拒，才能形成區域認同意識。在歐洲，伊拉克戰爭期間法國和德國等對多邊主義制度的捍衛，不惜以損害歐美關係為代價，其目的之一就是強化歐洲的集體認同。就像 Christopher Hill 所指出的，法國「為了可能的在世界上塑造獨特的歐洲身份方面的長期獲益，同時強化歐洲公民的意識，使之明白為什麼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對於它們來說是重要的，而決定接受對歐洲外交政策形象的短期損害。」²⁴ 但在東亞，情況卻截然不同。面對美國越過聯合國安理會貿然發動伊拉克戰爭，東亞各國的反應相去甚遠，不僅沒有一個國家像法國那樣為強化區域認同而竭力捍衛多邊主義制度，而且美國單邊主義的追隨者大有國在。雖然對西方價值觀和規範的排拒可以為東亞國家提供區域認同的基礎，但所謂的「亞洲價值觀」不是建立在「我們是什麼」，而是建立在「我們不是什麼」的基礎之上的。²⁵ 東亞區域認同的建構甚至還沒有真正進入區域安全建設的日程。

因此，雖然東協是東亞最成功的區域組織，在東亞區域化發展和區域安全構建方面功不可沒，但是，東協區域論壇和「10+3」與歐洲的同類機制相比，仍是臨時性的和軟弱的²⁶，東亞各國很難將「10+3」中的「3」由「3」個「1」變成「1」個「3」，進而再將「10+3」變為「13」，因此東協轉變為像歐盟那樣的區域組織的可能性不大。從歐洲的視角來看，區域化發展不僅需要區域主義形式，而且需要將區域主義形式制度化、機制化。然而，在東亞，區域化進程很大程度上是在沒有制度和機制的情況下發展的，雖然不能說沒有區域主義形式。²⁷ 甚至在「1990 年代中期之前，東亞國家之間……實際上沒有任何商業協定」²⁸，

²⁴ Christopher Hill, "Renationalizing or Regrouping? EU Foreign Policy since 11 September 2001,"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2, No. 1 (March 2004), pp. 143-163.

²⁵ 有關東亞區域認同與安全的關係，參見，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Essays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2nd editi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3);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²⁶ Lowell Dittmer, "The Emerging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in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4), pp. 331-362.

²⁷ Samuel Kim,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No. 1 (January/April 2004), pp. 39-67.

²⁸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更不用說安全制度和機制了。正式由於歐盟強調制度和機制的的作用，實行封閉性和排他性的區域主義，東協依靠非正式的民間交往，發展開放性和相容性的區域主義，因此才有人把歐洲的區域主義稱作「硬區域主義」（hard regionalism），把東亞的區域主義稱作「軟區域主義」（soft regionalism）。²⁹ 儘管在價值上，「硬」未必優於「軟」，但制度和機制的缺乏明顯已經成為東亞區域化進程和區域安全構建的主要障礙。³⁰ 很明顯，沒有有效的制度和機制建設，就難以保障東亞區域化和區域安全合作不會成為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犧牲品。

參、東亞區域安全合作的難題與歐洲經驗的不適用

一、兩種挑戰、兩種結局

區域外的霸權干涉和區域內的大國對抗是很多區域（北美除外）發展區域主義、構建區域安全的兩大主要挑戰。幸運的是，歐洲只是在部分程度上遭遇了前一種挑戰，即來自美國的干涉，而且很好地解決了後一種挑戰，實現了法德和解，因此，反過來，歐洲在應對前一種挑戰時迴旋的餘地和選擇的空間變得更大了。東亞有些不幸，因為兩個挑戰——美國的干涉和中日的對抗——不僅同時存在，而且還陷入了某種惡性循環的怪圈，令東亞要在有效應對兩個挑戰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變得異常艱難。如果說上文提到的東亞和歐洲區域主義發展在進程、邏輯、主要載體的權力結構、以及對政治認同的培育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並因此導致了安全機制建設方面的迥異，那麼所有這些不同更深層次的根源則在於它們各自面對的主要挑戰以及為應對這些挑戰而採取的對策大相逕庭。它們不僅可以說明為什麼東亞和歐洲在發展區域主義方面會呈現不同的進程、不同的邏輯，東協和歐洲會形成不同的權力結構，並對區域性政治認同採取不同的態度，進一步印證為什麼歐洲在安全機制建設方面有所成就，而東亞卻作為平平，而且還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歐洲區域安全合作的經驗並不直接適用於東亞。

²⁹ Peter Katzenstein,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Peter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44.

³⁰ Samuel Kim,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在一定程度上，歐洲和東亞在發展區域主義和構建區域安全方面都遭遇到了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而且，霸權干涉都來自同一個大國——美國，大國對抗——歐洲的法德對抗和東亞的中日對抗——也是何其相似乃爾。然而，不同的是，對於歐洲來說，霸權干涉的挑戰晚於大國對抗的挑戰，挑戰的程度都小於東亞；而對於東亞來說，霸權干涉的挑戰早於大國對抗的挑戰，而且挑戰的程度都超過歐洲。正是由於這種不同，歐洲和東亞的區域主義發展才分道揚鑣了。歐洲在美國想要阻撓之前，借用沒有外部干涉甚至還有一定外部支持的有利時機，先發解決了內部的大國對抗問題。法德和解的實現為歐洲區域主義發展和區域安全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美國對歐洲統合的質疑和阻撓是直到冷戰結束後才發生的。而當美國作為區域外霸權或「外來的支配力量」³¹對歐洲統合由不以為然到心存疑慮再到意欲干涉之時³²，這種外在的阻撓已經不能顛覆歐洲區域安全的構建了。

在東亞，情況幾乎正好相反。當東亞經歷金融危機的沉痛打擊之後，開始步歐洲後塵，推進區域一體化的時候，東亞首先迎來的是美國的直接阻撓。1997年，日本提出通過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來解決金融危機，但是，在美國的直接壓力下，日本的計畫被迫流產。以至於東亞國家面對危機沒有任何區域性的選擇，只得接受主要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強加的解決方案。美國還通過強化雙邊安全機制，尤其是重新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新指南》（The Guidelines for Japan-US Defense Cooperation），間接阻撓東亞發展自己的區域性安全合作。美國的干涉和介入還在一定程度上使中日和解成為不可能。美國對美日聯盟的強調和《日美防衛合作新指南》的修訂，以及日本國內政治的變革，使冷戰後期實現的有限的中日和解不僅在冷戰結束之後難以為繼，而且很快退化為中日對抗。雖然不能把中日對抗完全歸因於美國干涉，但在發展區域主義、構建區域安全的問題上，二者卻日益形成了某種下降的消極螺旋。不解決美國干涉問題，就難以解決中日對抗問題，反之亦然。兩個挑戰共同陷東亞的區域主義和安全合作於困境之中，以至於東亞的區域化只能由中小國家發起、由邊緣向中心推進。

³¹ 戴維·卡萊歐（David P. Calleo）著，馮紹雷等譯，《歐洲的未來》，上海，上海人民，2003，頁28。

³² 參見，查理斯·庫普乾（Charles A. Kupchan）著，潘忠岐譯，《美國時代的終結》，上海，上海人民，2004，頁13。

二、美國干涉

由於任何區域性安排都是一種多邊主義安排，因此美國對東亞區域安全合作的阻撓與美國對多邊主義的態度直接相關。在二戰結束、兩極體系形成之前，美國對世界秩序問題的主要反應形式就是多邊主義，聯合國和佈雷頓森林體系是毋庸置疑的典型代表。冷戰的出現使美國對多邊主義的態度經歷了一次轉變。但是，美國並沒有簡單地站在多邊主義的對立面。美國反對蘇聯發展多邊主義嘗試，而自己卻在歐洲建立多邊主義安全組織，即北約。美國冷戰期間對多邊主義態度的兩面性還反映在它對歐洲和東亞安全秩序的不同安排上。與在歐洲發展多邊安全框架不同，美國在東亞只願意構建雙邊安全聯繫，美國對在東亞發展多邊主義就像對在歐洲發展雙邊主義一樣沒有興趣。³³ 已經廢除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仍然健在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韓美共同防禦條約》、《菲美共同防禦條約》等，都是美國冷戰期間在東亞構建雙邊安全關係的產物，並且很多至今還是美國維持東亞安全的支柱。冷戰結束以後，儘管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以發展多邊主義和區域主義進行回應，但是美國走的路卻恰恰相反，從多邊主義轉向單邊主義。美國對多邊主義的區域主義尤其排斥，美國對由自己領導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甚至都不願賦予其政治和安全使命，因此就更別指望它會對其他區域（不論歐洲還是東亞）的多邊安全合作另眼相看了。在東亞，美國不僅強化既有雙邊安全機制，還通過給予菲律賓和泰國「主要非北約盟國」（major non-NATO allies）地位、同新加坡討論成立「區域海上安全倡議」（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與東南亞高級國防官員開展香格里拉對話等作法，為東亞發展自己的區域安全機制設置障礙。

美國對多邊主義態度的轉變，是由美國的戰略目的決定的，即維持自己的霸權地位、阻止區域挑戰者的崛起。冷戰期間，美國把蘇聯發展多邊主義看作其構建區域霸權的工具，因此極力阻撓。冷戰後，美國繼續阻撓多邊主義嘗試，因為它擔心其他國家會像美國在冷戰期間通過支援多邊主義建立區域安全機制抗衡蘇聯那樣抗衡自己。美國堅信，任何區域安全共同體的構建都將最終成爲一種抗衡

³³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Summer 2002), pp. 575-607.

美國的勢力，而如果區域融合為一個緊密的行為體，那麼國際體系就會變為多極，美國的霸權就會式微。出於這種擔心，美國必然會不遺餘力地阻止多邊主義在區域層面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區域主義與美國單邊主義是水火不容的。

美國對歐亞區域安全機制的不同安排也是由其通過反對霸權來維持霸權的戰略決定的。不論歐洲的北約多邊安全體系和東亞的「軸心－輪輻」（hub-spoke）體系³⁴在結構上有多大不同，它們的作用卻是一致的，都旨在阻止霸權挑戰者在區域和體系層次上出現。即使在冷戰期間尋求建立多邊安全機構時，美國也從來沒有忘記以確保反映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為根本原則。美國不允許多邊組織具有獨立自主性，更不能容忍多邊組織異化為異己力量。北約就是典範。就像 John Ruggie 所指出的，「美國不尋求支持具有廣泛獨立性強權的正式的國際組織，那不是它的多邊主義議程。……北約組織中的「組織」從來沒有、現在也不決定其成員的集體安全」。³⁵ Michael Brenner 的話更是一語道破天機。他說，華盛頓的目的就在於「阻止任何可以抗衡美國的勢力或國家集團出現，美國政府對待歐盟也不例外。」³⁶ 前文提到的「三 D」條件無疑就是美國干涉歐洲統一、限制歐盟自主地位的極好注腳。美國連對歐盟都不例外，自然更不會對東協或東協主導的區域安全機制例外。

這種歷史回顧是必要的、值得的，因為我們現在擁有的區域安全秩序在某種程度上仍是其冷戰前身的延續。而在東亞跟在歐洲一樣，最主要的延續因素便是美國的大戰略。Robert Kagan 在分析美歐戰略的分歧時指出：「讓美國人去想像一個美國權力不在其中充當主要基石作用的國際秩序是非常困難的。這種觀念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奧爾布賴特充分地表達了它，她把美國稱作「不可或缺的國家」（the indispensable nation）。因此在談論美國大戰略時，除了促進自由國際秩序的目標之外，我們必須包括維持美國霸權這個極其重要的因素。」³⁷ 而反對多邊主義、阻撓區域主義、干涉區域安全的構建無疑是美國通過反對霸權來維持

³⁴ 潘忠岐，〈利益的交叉與意圖的錯位：美國「軸心－輪輻」式東亞安全框架下的中美關係〉，《中國評論》，2004，期 9，頁 19-23；龐中英，〈亞洲地區秩序的轉變和中國〉，《外交評論》，2005，期 8，頁 41-49。

³⁵ John Ruggie,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Summer 1992), pp. 589-590.

³⁶ Michael Brenner, "The CFSP Factor: A Comparison of United States and French Strateg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 3 (September 2003), pp. 187-209.

³⁷ Robert Kagan, "Strategic Dissonance," *Survival*, Vol. 44, No. 4 (Winter 2002-2003), pp. 135-156.

霸權戰略的題中應有之意。

三、中日對抗

冷戰期間，美國之所以沒有興趣在東亞建構多邊安全體系，反而代之以雙邊安排，除了美國自身的原因外，也是當時東亞特有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結構決定的。出現在歐洲的威協與戰略的一致性從來沒有在亞洲出現過。在歐洲，蘇聯作為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他者」，是唯一的威協來源。美國同大多數西歐國家對威協的性質和為消除威協採取集體行動的戰略認知沒有異議，這使得多邊安全機制的建立成為可能。但在東亞，雖然從朝鮮半島經臺灣海峽到中南半島，是冷戰除柏林牆以外的另一條前線，然而，東亞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結構並不像歐洲那樣明朗。東亞很多國家是東西方兩大陣營爭奪的對象，它們對威協的認知和對付威協應該採取的方法沒有共識。結果，東亞國家只能自行確定對威協的認知，並自行選擇對威協的反應，而不是謀求多邊合作和集體安全。其中，中國選擇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日本選擇了依靠美國。在很大程度上，日本的選擇是別無選擇的選擇。但是，為日本提供安全保障事實上已經使美國支持更廣泛的集體安全體系成為不可能。

中日之間的不同選擇不僅使美國在東亞建構多邊安全體系成為不可能，而且這種不可能還反過來使中日對抗成為不可避免。法德和解的歷史大背景是美國在歐洲構建的多邊安全體系，同處一個陣營、面對新的共同敵人為兩個宿敵放棄前嫌提供了有利條件和內在動力。這個歷史背景還使美國不僅容忍和接受，甚至歡迎和支持法德和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歐洲一體化。而中日關係在東亞所處的歷史大背景幾乎完全相反。與法德同屬一個陣營不同，中國和日本從一開始就分別屬於兩個對峙的陣營，中國被美國和日本共同看作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他者」。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東亞要像歐洲以法德和解為基礎那樣推進區域一體化，既沒有內在動力，更沒有外在條件。冷戰期間的對峙使中日矛盾一直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並因而為當今的中日對抗埋下了種子。從歷史問題到釣魚島主權爭端、從歷史教科書問題到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從改善日台關係到日本修憲派兵，更不用說日本海上自衛隊在中國專屬經濟區擊沉北韓間諜船隻事件、中國西北大學日本留學生事件、珠海集體買春事件、2004年亞洲杯足球賽事件，等等，有關中日對抗的表現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儘管有關中日之間在經貿、文化

和社會方面的交流與和解，也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但是，似乎當今中日關係的主旋律是對抗而不是和解。³⁸ 相比很多雙邊國際關係，中日關係異常脆弱，在一定意義上，中日關係甚至比異常複雜的中美關係還要複雜、還要難以處理。

除了歷史原因，中日對抗還與中日對歷史問題的處理、中日外交戰略的變革、美國東亞戰略的調整等因素有關。毋庸置疑，歷史問題仍是中日之間邁不過去的一道坎。日本認為自己已經道過歉了，而且自己也是戰爭受害者，甚至是唯一的原子彈襲擊受害者，東亞國家，特別是中國不應該繼續糾纏不休。中國則認為，日本一直缺乏認真的反省和坦誠的道歉，日本多次修改歷史教科書、首相屢次參拜靖國神社、政要不斷出來否認戰爭罪行，等等，都是明證。中日對歷史問題的認知分歧，從日本方面來看，在於日本一向不把自己看作亞洲國家，並且依仗美國的保護傘狐假虎威，日本因此不願認真清算自己的侵略歷史。在日本民族看來，如果美國是世界的例外（*exception*），那麼日本就是亞洲的例外。日本喜歡把自己看作西方國家，它不僅蔑視亞洲國家，而且疏遠亞洲國家。這種世界觀使日本對東亞國家對日本的形象認知不以為然，它甚至不屑於擔憂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會因歷史問題對其鄙視。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雖是二戰的勝利者，但是隨後的內戰使中國根本沒有得到勝利者應該得到的東西，甚至對侵略者的懲罰這最起碼的勝利品都沒有得到。與德國被分區佔領不同，日本被美國獨佔了（除北方四島被蘇聯佔領外）。如果說在歐洲戰場上對德國的分區佔領滿足了不同勝利者的物質和精神需求，那麼在亞洲戰場上，中國的這方面需求基本沒有得到滿足。缺乏對侵略者的報復和懲罰使中國人難以去除根深蒂固的受害感和羞辱感。這不能說不是歷史問題極易引燃中國人反日情緒的一個重要原因。³⁹

中日對抗在最近幾年的加劇反映了兩國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上升。而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反映的是兩國外交戰略的變革。隨強（*bandwagoning*）是日本在外交和安全方面的主要戰略選擇。這集中反映了日本歷史上的結盟習慣。日本在明治

³⁸ 參見，馮昭奎，〈中日關係：從歷史到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期 9，頁 35-40；查道炯，〈冷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與中國的對策〉，《當代亞太》，2004，期 11，頁 15-19；Michael Green and Benjamin Self, "Japan's Changing China Policy: From Commercial Realism to Reluctant Realism," *Survival*, Vol. 38, No. 2 (Summer 1996), pp. 35-58.

³⁹ 有關中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參見，〈中國青年對日本的認識——大型讀者調查〉，《中國青年報》，1997，2月15日，版 8；蔣立峰，〈中國民眾對日本很少有親近感——第一次中日輿論調查結果分析〉，《日本學刊》，2002，期 6，頁 1-18。

維新以後曾和當時的霸主英國結成聯盟關係（1902年）。二戰期間，日本同當時實力強大的歐洲霸主德國和義大利組成軸心國。二戰後，日本唯一結盟的國家就是現在的霸主美國。但前兩次結盟是主動和自願的，最近一次則是被動和無奈的。因此，經濟立國成爲戰後日本的長期方略，美國的保護傘使日本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政治和安全領域有所作爲。然而，冷戰以後，日本經濟發展出現了問題，經濟停滯和經濟危機使日本開始反思國家發展戰略問題，反思的結果是把日本的問題歸因於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日本政府開始致力於經濟和政治改革，經過執政黨和內閣的頻繁更換之後，新近上臺並連任的小泉純一郎政府重新爲日本確立了外交立國的方針。最明顯的表現是：日本明確提出要成爲「正常國家」（normal state）；日本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于 1991 年向海灣區域派遣掃雷艇編隊，這是自 1945 年以來日本自衛隊第一次跨出國門參與國際軍事行動；2001 年 11 月 9 日，借美國發動反恐戰爭之機日本再度向海外派遣海上自衛隊；2003 年 6 月日本進一步借美國發動戰爭之機向伊拉克派遣自衛隊，這是日本自衛隊第一次在戰鬥仍在進行之中、未經聯合國授權的維和行動區域執行任務；日本還通過一系列法律、法案⁴⁰，旨在最終修改憲法⁴¹；日本極力推動聯合國改革並謀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等等。日本外交戰略的變革進一步加劇了亞洲國家的疑慮和中國的質疑，而外部反應所激發的民族主義情緒又爲日本政府所利用，成爲推進既定戰略的動力。

相比而言，中國外交戰略在冷戰後也進行了調整。最大的調整就在於，由強調以美國爲主、發展雙邊外交向重視全方位、發展多邊外交轉變。中國外交不再僅僅圍著美國轉，而是全面出擊，同歐盟、俄羅斯、日本、東協等建立全方位的外交格局，並強調以發展多邊外交爲主。1990 年代以來，中國的多邊外交努力主要體現在三個層次上。第一個層次，中國在東亞尋求擴大東協的機制和規範，並

⁴⁰ 自 1992 年日本出臺《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第一次授權日本派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日本已經頒佈了二十幾項有關國防安全的主要法律、法案，其中僅 2004 年就有 9 項。著名的有《周邊事態法》、《反恐怖活動特別措施法》、《伊拉克重建特別措施法》、《反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自衛隊法修改案》、《美日物品與服務相互提供協定修改案》等。有關這些法律和協定的完整列表，參見，Richard Tanter, “Japanese Militarization and the Bush Doctrine,” *Japan Focus*, February 15, 2005, at <http://japanfocus.org/221.html>.

⁴¹ 小泉領導的日本自民黨曾計畫在 2005 年 11 月建黨 50 周年時提出新憲法。1955 年自民黨建黨時黨章提出的基本目標就是「確立日本自己的憲章」。當然，「最終在日本國土上清除美國軍隊」也是該黨最初目標。

同俄羅斯、中亞和南亞周邊國家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成立上海合作組織。中國領導人提議在東協框架下開展軍事對話，並於 2004 年 11 月在北京承辦東協區域論壇安全政策會議。另外，中國領導人已經不再單純談論「中國崛起」，而是代之以「亞洲復興」。2004 年 4 月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發表演講「中國的發展亞洲的機遇」，明確闡述了中國對區域安全多邊主義的立場。他說：「中國將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希望同各國建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安全合作關係。中國將同亞洲國家加強在區域反恐、打擊跨國犯罪、海上安全、防擴散等安全領域的對話和合作，充分發揮多邊安全機制的積極作用。中國願同各國建立軍事安全對話機制，積極推動軍事領域信任合作措施。」第二個層次，中國同歐盟建立跨區域戰略夥伴關係。第三個層次，中國在聯合國及安理會中發揮積極作用。正是在從雙邊外交向多邊外交轉變這個意義上，國外有學者認為中國外交實現了一次革命性的變革。⁴² 與此相伴，中國對自身的身份定位也進行了反思。就像有學者指出的，「在 1980 和 1990 年代中國的自我認同經歷了一次變革，一次轉型。傳統的以主權為中心的、自主的大國身份……已經不輕鬆地同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新身份聯繫了起來，這個負責任大國的資格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參與越來越制約跨國行為的制度來評估的。」⁴³ 很明顯，與日本同美國越走越近不同，中國同美國雖不是漸行漸遠，也是一直保持一定距離。與日本相似的是，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與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構成了互動。

中日外交戰略的調整既是各自國內政治的延續，也是對美國調整東亞戰略所作的不同回應。冷戰後，美國把中國確定為潛在的對手和長期的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認為臺灣海峽、朝鮮半島和南海等熱點爭端可能對美國國家利益和全球戰略部署構成威脅，而威脅的主要來源就是中國，因此，美國開始把戰略重心逐漸地和部分地東移至東亞區域，強調以美日同盟為基軸構建新的東亞安全體系。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美國於 1997 年同日本重新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新指南》，敦促日本修改憲法第九條（即除自我防衛外決不使用武力），鼓勵日本重整軍備，實現海外派兵合法化，參加美國導彈防禦體系

⁴² Evan Medeiros and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22-35.

⁴³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52.

(TMD)，插手臺灣問題，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等。2004年8月13日，美國國務卿 Colin Powell 在東京毫不掩飾地說，如果日本要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就必須首先摒棄其和平主義憲法。⁴⁴ 美國的戰略調整和想要把日本變為「遠東英國」的戰略意圖⁴⁵ 與日本的需求不謀而合，它使日本在政治和安全領域有所作為既成為需要，也成為可能。日本的外交戰略於是變成了全面支持美國，依靠美國發展軍事國防，修改憲法成為「正常國家」，確立世界領導地位，與美國結為「全球聯盟」。與日本的反應不同，中國的做法是，在不對美國說不的同時，尋求通過多邊外交，繼續走自力更生、獨立自主之路。

美國對東亞安全區域化的阻撓和美日接近使中日接近變得異常艱難，而中日對抗反過來又為美國的戰略調整提供了理由。冷戰以來，日本一直沒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對華政策尤其如此。就像 Andrew Nathan 和 Robert Ross 所指出的，「當日本最終決定同中國開展關係的時候，其動力不是來自於中國對日政策的發展，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發展。」⁴⁶ 日本的外交政策一向唯美國馬首是瞻。如果說在冷戰期間日本這樣做是出於無奈，那麼現在，日本則是出於自願。成為美國在亞洲的代理人是日本的夢想，利用中美矛盾與美國接近、實現美國外交政策日本化則是日本的策略。但結果卻是，中日對抗越強烈，中美關係越冷淡，美日關係就越親近。反之，亦然。只有當美日關係清淡或疏遠、中美關係親熱時，中日對抗才會得到緩解。這既是中美日三邊關係的特點，也是為什麼美國干涉和中日對抗會在東亞區域安全合作問題上陷入消極螺旋的原因。

美國直接阻撓東亞構建區域安全的直接後果和通過妨礙中日和解防止東亞建構安全共同體的間接後果對於東亞區域主義來說都是災難性的。中日對抗的後果則是中國和日本都不能在東亞區域一體化和區域安全構建方面發揮本該發揮的領導作用。與其說中國和日本都不情願在東亞區域一體化過程中承擔領導角色，不如說中國和日本都不情願讓對方承擔這樣的角色。日本當初不惜惹惱美國勉強參加「10+3」進程的初衷，就是抗衡中國。就像 Richard Stubbs 所說的，「儘管日

⁴⁴ 轉引自 Chalmers Johnson, "No Longer the 'Lone' Superpower: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a," The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105, March 2005, at <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105.html>.

⁴⁵ Richard Armitage, et 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 INSS Special Repor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October 11, 2000.

⁴⁶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W. Norton, 1998), p. 85.

本仍然不情願參與（10+3），但中國政府同意接受東協的邀請迫使東京別無選擇。北京感興趣的是建立同東南亞的經濟聯繫，日本政府無法接受讓中國在這個區域獲得沒有競爭的領導地位。」⁴⁷ 中日對抗、美國干涉、以及兩種挑戰的消極螺旋，使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無法形成法德軸心那樣的核心，使東亞無法直接借鑒歐洲區域安全合作的經驗，無法以歐洲方式協調解決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兩大挑戰，一句話，使歐洲模式無法直接應用於東亞。

肆、東亞區域安全的未來與歐洲經驗的適用

一、歐洲經驗的不適用於並不意味著東亞將沒有區域安全合作的未來

歐洲已經成為研究區域主義的摹本、構建區域主義理論的基礎、以及評判其他區域類似區域主義計畫的尺規。從歐洲視角審視東亞的區域安全合作，得出的結論或許令人沮喪，但並不出人意料。實際上，很多學者已經對歐洲經驗是否適用於東亞或其他區域提出了質疑，甚至有人認為歐洲計畫並不適合於作為比較分析的基礎。例如，William Wallace 就認為，理解歐洲區域一體化的關鍵是要認識它獨特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他反詰道：其他區域所特有的文化和歷史背景與歐洲不同，歐洲怎麼能為世界其他區域提供區域進程的模式呢？⁴⁸ 本文從歐亞區域主義發展的不同進程與邏輯、安全機制建設方面的差異、內外挑戰的區別，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但是，歐洲經驗的不適用並不意味著歐洲經驗對於東亞區域安全的構建沒有任何借鑒意義，也不意味著東亞將沒有區域安全合作的未來。它只是意味著，東亞不能完全、直接仿效歐洲的經驗，克隆歐洲的模式，遵循歐洲區域化的進路，建立與歐盟相象的區域組織。質言之，它只是意味著，東亞必須從自己特有的實際情況出發克服推進區域化、構建區域安全的障礙，確立東亞特有的模式，尋找東亞區域化特有的進路，建立東亞特有的區域組織。研究當代東亞區域主義的學者都知道，區域一體化具有多種形式，歐洲並不是東亞未來發展的唯一樣板。⁴⁹

⁴⁷ Richard Stubbs, "ASEAN Plus Three."

⁴⁸ William Wallace,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1994).

⁴⁹ 參見，耿協峰，〈地區主義的本質特徵——多樣性及其在亞太的表現〉，《國際經濟評論》，

即使東亞不能發展出與歐洲相似的區域組織，也並不意味著東亞就沒有區域化的未來。雖然歐洲的今天未必是東亞的明天⁵⁰，但是，歐洲的今天並不是東亞明天的唯一可能性，歐洲的今天不能成為東亞的明天並不意味著東亞就沒有自己的區域一體化的明天。

二、安全共同體在東亞的可能性

關於歐洲的今天能否成為東亞的明天，爭論的焦點並不僅僅在於東亞能否建立與歐盟相象的區域組織，而且更在於東亞能否像歐洲那樣建立區域性「安全共同體」（security community）。就形式而言，歐洲一體化可以被形容為「安全共同體」。儘管東協在 2003 年《巴厘第二宣言》（Bali Concord II）中已經明確提出了建立「安全共同體」的設想⁵¹，東亞思想庫網路（Network of East Asian Think-tanks – NEAT）也證實建構東亞安全共同體已經成為東亞各國的共識⁵²，但是，安全共同體在東亞究竟是否可能，還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安全共同體」這個名詞最早是由 Karl Deutsch 在 1957 年提出來的。根據 Karl Deutsch 的觀點，「多元安全共同體」（pluralistic security community）的關鍵特徵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框架內，國家不再尋求把使用武力作為維護它們各自利益的手段（非暴力的問題解決）（non-violent problem solving）；共同體成員秉持相同的基本政治價值觀（相互接受的政治價值觀）（mutually accepted values）；共同體成員以其他成員可以預測的行為方式行動（可以依賴的預期）（dependable expectations）。⁵³ 後來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學派對「多元安全共同體」概念作了進一步發展。Emanuel Adler 和 Michael Barnett 提出，「多元安全共同體」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共同體內的國家成員擁有共同的集體認同

2002，期 1-2，頁 51-55；肖歡容，〈地區主義及其當代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2000，期 2，頁 58-62；龐中英，〈地區化、地區性與地區主義——論東亞地區主義〉，《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期 11，頁 1-9；蘇浩，〈從啞鈴到橄欖：亞太合作安全研究〉，北京，世界知識，2003。

⁵⁰ Richard Higgot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⁵¹ ASEAN,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 II (Bali Concord II)," Bali, Indonesia, October 7, 2003, at <http://www.aseansec.org/15159.htm>.

⁵² 秦亞青、王燕，〈建構共同體的東亞模式〉，《外交學院學報》，2004，期 12，。

⁵³ 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 5-9.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和集體價值觀念。其他特徵如多方位互動、互惠、利他等都是建立在集體認同基礎之上的。⁵⁴

按照這個定義，今天的歐盟可以看作一個「多元安全共同體」，而今天的東亞不僅遠不是一個「多元安全共同體」，甚至東亞區域安全合作是否在向「多元安全共同體」方向邁進都是一個疑問。如果應用多伊奇等人的一套標準，那麼很明顯，放棄暴力、相容的價值觀、共同的集體認同和可以依賴的預期是形成一個多元安全共同體所必需的。而幾乎所有這些特徵，東亞都相當缺乏。⁵⁵

雖然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冷戰結束以來，地緣政治的對抗正逐步讓位於地緣經濟的競爭，但僅就東亞而言，這樣的轉變並不明顯，地緣政治仍是影響大國關係和區域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同於經濟領域，在政治和安全領域，主權和安全仍是東亞大國的先天之憂，它們依舊遵循傳統的思維邏輯，把國家安全看作自助的和零和的，尚未把本國的安全真正維繫在整個區域的安全之上。東亞國家之間的安全顧慮、主權和領土糾紛決定它們還不可能放棄把武力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

⁵⁶有關各方在解決朝鮮半島、臺灣海峽、南海區域爭端問題上的政策宣示和外交言辭就是明顯的說明。如，臺灣海峽是東亞區域最具爆炸性的潛在衝突熱點，中國大陸一直沒有承諾放棄以武力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國家統一。

在政治價值觀方面，東亞國家之間明顯缺少共同基礎。這似乎並不僅僅事關民主體制的普遍性問題，東亞國家無疑在民主體制方面沒有多少共性，但是，除了政治結構和政治體制的差別、宗教信仰和文化體系的不同之外，正如上文所述，威協認知和安全觀念的迥異也是造成東亞國家難以形成共用價值觀的重要原因。所謂的「亞洲價值觀」由於缺乏獨特的與西方價值觀不同的實質性內涵，因此更多的是一種區域性意識形態。

與缺乏相容價值觀直接相關的便是集體認同的難以確立。由於東亞各國之間缺少共同的威協認知和安全觀念，缺少共用的主導價值觀，缺少共同的制度和規

⁵⁴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0-31.

⁵⁵ 值得一提的是，Barry Buzan 和 Ole Waever 從他們提出的「區域安全複合體理論」(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出發，認為東亞作為一個「超級安全複合體」(supercomplex) 正在走向「安全共同體」。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Regions and Powers*, pp. 164-173.

⁵⁶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Summer 1994), pp. 3-21; Aaron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94), pp. 5-33.

範，因此區域意識和區域認同難以形成。⁵⁷ 東亞很多國家不是把獨立自主看作至高無上，如中國，就是把隨強依賴奉為絕對真理，如日本。直到現在，有些國家才剛剛意識到通過加強區域接觸建構區域集體認同的重要性，而有些國家甚至連這一點還沒有認識到，更不用說為塑造東亞的區域認同和區域身份有所貢獻了。

區域認同沒有提上議事日程還與東亞各國之間缺乏可以依賴的預期互為因果。雖然東亞中小國家之間在安全互賴和主權共用方面沒有太大的障礙，但在大國與大國之間、大國與小國之間卻困難重重。區域大國對區域領導權的爭奪，更準確地說，對領導權落入對手手中的擔憂，使它們既對區域主義發展缺乏積極參與和積極領導的熱情，又對其他大國發揮相似作用的動機心存疑慮。⁵⁸ 區域中小國家既希望大國參與，不被大國邊緣化，又希望它們在區域化中的相對權力不被大國參與所破壞。這種矛盾心態說明，東亞各國之間可靠的行為預期還遠遠沒有建立起來。例如，日本在能夠就歷史問題做出一個能被其他東亞國家接受的處理之前，是很難贏得東亞國家的信任和承認的。而在中日等大國之間確立可以依賴的預期之前，東亞不僅不可能出現大國「多元核心」⁵⁹，而且區域大國與區域中小國家之間可以依賴的預期也難以建立。

非暴力的問題解決、相容的政治價值觀、共同的集體認同和可以依賴的預期是彼此緊密關聯的。這些關鍵特徵的缺乏是東亞尚未建成多元安全共同體的根本，是東亞區域化進程滯後於歐洲的原因，也是對東亞能否建成安全共同體產生疑惑的原因。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東亞一定不能建成多元安全共同體，更不能說明東亞沒有區域安全的未來。

三、東亞區域安全的前景

依據「多元安全共同體」理論，由於不存在非暴力的問題解決、相容的政治

⁵⁷ 劉興華，〈地區認同與東亞地區主義〉，《現代國際關係》，2004，期 5，頁 18-22；吳志成、李敏，〈亞洲地區主義的特點及其成因：一種比較分析〉，《國際論壇》，2003，期 6，頁 14-20。

⁵⁸ Lowell Dittmer, "East Asia in the 'New Era'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1 (October 2002), pp. 38-65; Richard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2/93), pp. 32-75.

⁵⁹ David Kang,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3-190. 關於區域層面的「多元核心」問題，參見，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價值觀、共同的集體認同和可以依賴的預期，因此東亞既缺乏歐洲那樣的區域安全機制，也沒有建成歐洲那樣的多元安全共同體。⁶⁰ 但是，進一步講，東亞之所以尚未形成多元安全共同體的關鍵特徵，是因為東亞沒能像歐洲那樣解決好發展區域主義、構建區域安全的兩大挑戰。由於歐洲和東亞儘管都面臨著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但是挑戰程度和邏輯的不同，決定它們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和路徑解決這些挑戰，因此歐洲經驗並不直接適用於東亞。然而，另一方面，要建構多元安全共同體，東亞必須像歐洲那樣處理好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在這一點上歐洲經驗無疑又是適用於東亞的。而這恰恰是以歐洲作為參照系審視東亞安全合作的真正意義所在。

在東亞跟在歐洲一樣，只有解決好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才能逐步形成相容的政治價值觀，才能培育共同的集體認同，才能實現非暴力的問題解決，才能構築可靠的行為預期，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因此才有可能。但與歐洲不同的是，東亞不可能在爭取大國支持或默許的前提下實現大國和解，通過大國和解促成大國「多元核心」的出現，並轉而進一步應對霸權干涉問題。那是歐洲構建區域安全的邏輯。這個邏輯不適用於東亞。因為在東亞，不僅大國支持的前提不存在，而且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惡性循環使通過先發解決大國對抗進而解決霸權干涉成為不可能，因此東亞必須尋找不同的解決邏輯。

理想的方案是，在東亞，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得到同步協調解決。如何在有效應對兩個挑戰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無疑是東亞構建區域安全面臨的主要障礙。這不僅需要中日之間消除對彼此的猜忌和不信任，而且需要同步消除美國對中日和解的擔憂和對東亞區域安全未來的疑慮。如前文所述，要做到這一點在可預見的將來是不可能的。

替代的選擇方案是，暫時同步擱置或凍結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例如，有人提出，既然中日和解和美國干涉之間已經出現了消極螺旋效應，而同時解決兩者幾近不可能，那麼東亞國家必須考慮放棄歐洲的「法德模式」，思考「英國模式」的可能性。⁶¹ 所謂的「英國模式」作為歐洲模式的另一種表述，可能意味

⁶⁰ Barry Buzan 認為「安全機制」是「安全共同體」的必要前提。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1991), p. 218.

⁶¹ 關於「英國模式」，參見，王毅，〈亞洲區域合作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2005，期

著，東亞需要在日本不參與的情況下，先在東亞大陸構建安全共同體的基本框架，然後再在時機成熟時歡迎日本加入，就像歐洲經濟共同體在成立 16 年之後（1973 年）才將一直與歐洲一體化進程保持一定距離的英國吸收進來那樣。

然而，東亞的日本畢竟不同於歐洲的英國。受歷史上帶有強烈孤立主義色彩的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戰略即「光輝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影響，英國主動與歐洲統合進程保持距離。二戰後英國實力的衰落使其干涉大陸事務的能力銳減，因而對歐洲統合進程保持了相對的放手（hand-off）政策。而且，英國並不認為不參與歐洲統合進程會有損英國的安全和利益。只有隨著統合前景的日益明朗，英國才採取了主動參與的政策，成為歐洲一體化的一分子。另外，當歐洲統合進程同美國戰略出現矛盾和分歧時，英國主動擔當起橋樑角色，對歐洲區域安全建設的進程起到了積極作用。

但是，日本的情況與此有很大不同。儘管日本與英國具有明顯的地緣相似性，但日本歷史上一貫追求成為東亞的區域霸主，而不是英國那樣的離岸平衡手。在東亞的區域化進程中，日本的實力不是在走向衰落，而是在不斷崛起，成為一個政治影響力與經濟影響力相匹配的「正常國家」日益提上日本的議事日程。日本極其擔心被東亞統合進程邊緣化，因而不是與之保持距離，而且主動參與，甚至極欲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⁶² 但是，在東亞深感孤立的日本離不開美國支持，美日雙邊同盟的存在既是日本發揮作用的杠杆，又是日本參與東亞區域化進程的掣肘。而且，當東亞區域化與美國戰略出現不一致時，日本往往會選擇倒向美國，難以在美國與東亞之間發揮橋樑作用。儘管日本標榜自己是東亞的英國，是美國與東亞的橋樑，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日本對美國的戰略依賴、對中國可能主導東亞區域化進程的擔憂、對東亞區域安全建設的積極參與，使之既不能像英國那樣暫時遠離東亞區域化進程，也不能像英國那樣充當美國與東亞之間的橋樑。日本與英國的這些不同，加上美國的不寬容，使「英國模式」像「法德模式」一樣，也是不適用於東亞的。

另外一種暫時同步擱置或凍結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思路是，將霸權干涉和

2，頁 56-60；Takashi Inoguchi, "Japan's Ambition for Normal Statehood," in Jorge Dominguez and Byungkook Kim, eds., *Between Compliance and Conflict: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New" Pax America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35-164.

⁶² Takashi Inoguchi, "Distant Neighbors? Japan and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 94, No. 595 (November 1995), pp. 392-369.

大國對抗的挑戰暫時撇開，以東協現有結構為中心，繼續發揮中小國家的領導作用，在東亞區域化進程取得更大進展的基礎上，再來逐步解決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兩大難題。同步擱置或凍結的路徑意味著，在不能協調解決兩大挑戰的情況下，必須爭取避免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對已經起步的區域安全構建構成實質性的傷害，並藉此讓東亞從邊緣到中心的區域主義邏輯繼續演繹下去。這可能意味著，東亞目前只能發展有限的區域主義，實現有限的區域化，建構有限的區域安全結構和一種不完全的安全共同體。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只能在此之後尋求解決。儘管不盡理想和完美，但相比而言，這條思路可能是唯一現實和可行的。自主才能自立。缺乏自主性是當前東亞區域安全構建的重要特徵。建立哪怕是一種不完全的安全共同體，也是東亞區域安全走向自主的必要步驟。一旦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安全共同體在東亞成形，東亞安全合作實現了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的自主，那麼大國對抗和霸權干涉的挑戰就會變得更易於解決，東亞區域安全的自立也就可以指望了。

毋庸置疑，東亞區域安全的未來既不是單行道，也不存在預設的軌跡，而是充滿了變數。東亞能否與歐洲殊途同歸，為整個區域帶來多元安全共同體的美好明天，仍難以預期。可以肯定的是，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能否得到或者同步協調解決或者同步協調擱置是東亞區域安全未來的決定性因素。否則，東亞區域安全的前景不僅難以樂觀預期，甚至會像有些人擔憂的那樣，東亞的未來可能會重現歐洲過去的大國對抗，不但歐洲的今天不能成為東亞的明天，反而「歐洲的過去可能會成為亞洲的未來」。⁶³

伍、結 論

冷戰以後，區域主義在全球範圍的興起使區域安全的構建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東亞也把構建區域安全作為發展區域主義的重要價值指向。但是，與歐洲的進程相比，東亞在區域安全合作方面相對進展緩慢，最明顯的表現是，以東協為主要載體的東亞區域化沒能構建有效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目前，以東協為基礎

⁶³ Aaron Friedberg, "Ripe for Rivalry;" Aaron Friedberg, "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Survival*, Vol. 42, No. 3 (September 2000), pp. 147-160.

的東協區域論壇和「10+1」、「10+3」是東亞區域安全機制建設的主要成果，尤其是其中的「10+3」，不僅最具區域色彩，而且已經成為該區域最重要的多邊經濟和安全合作機制。但是，它仍然沒法與歐洲的同類機制相媲美，且不能擔當支撐東亞區域安全的重任。如果說在歐洲以區域安全框架為依託的區域治理已經成為歐洲和平與安全的關鍵，那麼在東亞區域安全的構建和奠基於區域安全框架之上的區域治理還只是一種設想。東亞未能發展有效安全機制、構建區域安全框架是由東協鬆散的權力結構、東亞區域化由邊緣到中心的演進邏輯、東亞區域認同的缺乏等因素合力造成的。

雖然東亞區域化和歐洲區域化的歷史背景不無相似之初，並且都面臨著區域外霸權干涉和區域內大國對抗的嚴重挑戰，但是，兩種挑戰的邏輯明顯不同，對待挑戰的方法迥異。因此，歐洲構建區域安全的經驗難以直接適用於東亞。在歐洲，由於大國對抗的挑戰先於霸權干涉，因此，歐洲首先實現了法德和解，進而通過內部統合來應對美國干涉的外部挑戰。但在東亞，由於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幾乎同時存在，而且作為外部挑戰的美國干涉和作為內部挑戰的中日對抗還陷入了某種惡性的螺旋怪圈，因此，東亞無法照搬歐洲經驗解決東亞問題。中日對抗，加上美國干涉，使東亞區域安全的構建不僅無法形成法德軸心那樣的核心，而且無法將多元安全共同體的理想變為現實。大國對抗和霸權干涉的消極互動使東亞區域尚無法達成非暴力的問題解決、相容的政治價值觀、共同的集體認同和彼此可以依賴的預期。

當然，歐洲經驗的不適用並不意味著東亞不能像歐洲那樣逐步邁向多元安全共同體，而只是意味著，東亞必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克服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發展東亞特有的區域安全模式。同步協調解決或者同步協調擱置霸權干涉與大國對抗的挑戰或許是東亞之路的兩種可能。前者要求在有效應對兩個挑戰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在消除中日之間彼此猜忌的同時，消除美國對中日和解的擔憂和對東亞區域安全未來的疑慮。後者要求將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暫時撇開，先在東亞大陸構建有限的區域安全的基本框架。後一種方案意味著，東亞目前只能致力於構建一種不完全的、有缺陷的安全共同體。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只能在此之後尋求解決。無論如何，東亞區域化面臨的複雜局勢，決定不存在任何輕鬆的構建區域安全的捷徑。對東亞區域安全的構建寄予過高預期依然是不現實的。在現階段無法同步協調解決兩大挑戰的情況下，如何有效擱置或凍

結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並在此基礎上繼續推進東亞區域安全進程，則是目前迫切需要政界和學界進一步深入探討的重大課題。

參考文獻

Aaron Friedberg, 1993, "Ripe f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pp. 5-33.

Aaron Friedberg, 2000, "Ripe for Rivalry;" Aaron Friedberg, "Will Europe's Past Be Asia's Future?" *Survival*, Vol. 42, (No. 3), pp. 147-16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Paul Evans, 1998, "China's Engagement 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Amitav Acharya, 2003,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Regionalism and Multilateralism: Essays on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2nd editi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Andrew Nathan and Robert Ross, 1998,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W. W. Norton.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1994,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pp. 3-21.

Barry Buzan and Ole Wae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ry Buzan, 1991,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Wheatsheaf.

Benedicte Bull, 1999, "'New Regionalism' in Central Ame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pp. 957-970.

Charles Kupchan, 1998, "After Pax American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a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2), pp. 40-79.

Chris Layne, 2001, "US Hegemony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NATO," *Ted Galen Carpenter, ed., NATO Enters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Frank Cass.

Chri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Katzenstein, 2002,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pp. 575-607.

Christopher Hill, 2004, "Renationalizing or Regrouping? EU Foreign Policy since 11 September 2001,"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2, (No. 1), pp. 143-163.

David Kang, 2003,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163-190.

Denny Roy, 1994,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pp. 149-168.

Douglas Webber, 2001,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pp. 339-372.

Douglas Webber, 2003,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akashi Terada, 2003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 + 3,"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pp. 251-277.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Milner, 1999,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 3), pp. 589-627.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1998,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van Medeiros and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3), pp. 22-35.

Fredrik Söderbaum and Timothy Shaw, eds., 2003, *Theories of New Regionalism: A Palgrave Reader* (Basingstoke: Palgrave).

Helen Wallace, 2002, "Europeanisation and Globalisation: Complementary or Contradictory Trends?" in Shaun Breslin, et al, eds., *New Regionalism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Theories and Cases* (London: Routledge).

John Ruggie, 1992, "Multilateralism: 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3), pp. 589-590.

Karl Deutsch, et al., 1957,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shore Mahbubani, 1995, "The Pacific Way,"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1), pp. 100-110.

Lowell Dittmer, 2002, "East Asia in the 'New Era'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1), pp. 38-65.

Lowell Dittmer, 2004, "The Emerging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 Order," Samuel Kim, 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Lanham,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Markus Hund, 2003, "ASEAN Plus Three: Towards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pp. 383-418.

Michael Brenner, 2003, "The CFSP Factor: A Comparison of United States and French Strategie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 3), pp. 187-209.

Michael Green and Benjamin Self, 1996, "Japan's Changing China Policy: From Commercial Realism to Reluctant Realism," *Survival*, Vol. 38, (No. 2), pp. 35-58.

Muthiah Alagappa, ed., 1998, *Asian Security Practice: Material and Ideational Influ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ul Bowles, 1997, "ASEAN, 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Vol. 70, (No. 2), pp. 219-233.

Peter Katzenstein, 1996,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1, (No. 2), pp. 123-159.

Peter Katzenstein, 1997, "Introduction: Asian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eter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Peter Katzenstein, 2001, "Reg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Peter Katzenstein, 2005,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aimo Vayrynen, 2003, "Regionalism: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5, (No. 1), pp. 25-51.

Richard Armitage, et al., 2000,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 INSS Special Report,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Richard Betts, 1992,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pp.32-75.

Richard Florida, 1995, "Toward the Learning Region," *Futures*, Vol. 27, (No. 5), pp. 527-536.

Richard Higgott, 1998,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Europe and Asia Compared," in William Coleman and Geoffrey Underhill, eds., *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urope, Asia, and the Americas*. London: Routledge.

Richard Stubbs, 2002,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Asian Survey*, Vol. 42, (No. 3), pp. 440-455.

Robert Kagan, 2002, "Strategic Dissonance," *Survival*, Vol. 44, (No. 4), pp. 135-156.

Robert Lawrence, 1996, *Regionalism, 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Samuel Kim, 2004, "Reg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4, (No. 1 January/April), pp. 39 -67.

Takashi Inoguchi, 1995, "Distant Neighbors? Japan and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 94, (No. 595), pp. 392-369.

Takashi Inoguchi, 2005, "Japan's Ambition for Normal Statehood," Jorge Dominguez and Byungkook Kim, eds., *Between Compliance and Conflict: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New" Pax Americana*, New York: Routledge.

William Wallace, 1994,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West European Experienc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Charles A. Kupchan 著，2004，《美國時代的終結》，潘忠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David P. Calleo 著，2003，《歐洲的未來》，馮紹雷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對日本的認識——大型讀者調查〉，1997，《中國青年報》，2月15日，版8。

王毅，2005，〈亞洲區域合作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期2，頁56-60。

吳志成、李敏，2003，〈亞洲地區主義的特點及其成因：一種比較分析〉，《國際論壇》，期6，頁14-20。

肖歡容，2000，〈地區主義及其當代發展〉，《世界經濟與政治》，期2，頁58-62。

查道炯，2004，〈冷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與中國的對策〉，《當代亞太》，期11，頁15-19。

耿協峰，2002，〈地區主義的本質特徵——多樣性及其在亞太的表現〉，《國際經濟評論》，期1-2，頁51-55。

馮昭奎，2005，〈中日關係：從歷史到未來〉，《世界經濟與政治》，期9，頁35-40。

劉興華，2004，〈地區認同與東亞地區主義〉，《現代國際關係》，期5，頁18-22。

潘忠岐，2003，〈新功能主義擴溢理論及其批判〉，《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期5，頁8-13。

潘忠岐，2004，〈利益的交叉與意圖的錯位：美國「軸心—輪輻」式東亞安全框架下的中美關係〉，《中國評論》，期9，頁19-23。

潘忠岐，2004，《世界秩序：結構、機制與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蔣立峰，2002，〈中國民眾對日本很少有親近感——第一次中日輿論調查結果分析〉，《日本學刊》，期6，頁1-18。

閻學通，1999，〈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東亞季刊》，第30卷春季，第2期，頁97-110。

龐中英，2003，〈地區化、地區性與地區主義——論東亞地區主義〉，《世界經濟與

政治》，期 11，頁 1-9。

龐中英，2005，〈亞洲地區秩序的轉變和中國〉，《外交評論》，期 8，頁 41-49。

蘇浩，2003，《從啞鈴到橄欖：亞太合作安全研究》，北京：世界知識。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East Asia: Proces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Zhongqi Pan⁺

ABSTRACT

With 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the building of regional security has become the key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progress of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is quite slow comparative with that in Europe. Regionalization in East Asia does not develop effective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yet. Different from the logic of European regionalization that is from the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the process of regionalization in East Asia is from the periphery to the center. Given that both external interfer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l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East Asia not only present almost simultaneously, but also fall into a vicious downward spiral, East Asia could not directly follow the way of Europe. However, European experience is applicable in East Asia in the sense that the process of regionalization depends on the settlement of great power interference externally and great power rivalry internally. At present, what East Asia could seek to achieve is only a kind of limited regionalism, inadequate regional security framework, and partial security community.

Keywords: East Asia, Regionalism, Regionalization, Regional Security, Europe

⁺ Dr. Zhongqi P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E-mail: zqpan@fudan.edu.cn

